

美國在兩次波斯灣戰爭的媒體管理分析

方鵬程

新聞學系

助理教授

摘 要

本文採用歷史與文獻分析法，分別針對兩次波斯灣戰爭做個案探討，將主要檢視對象置於美國政府及美軍所展現的媒體管理策略與作為上。

本文主要在回答以下三個問題：美國政府及美軍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的媒體管理策略與作為為何？在 2003 年波斯灣戰爭又有那些媒體管理策略與作為？這兩次相距 12 年的戰爭在媒體管理策略與作為上究竟有何關連？貫穿兩次波斯灣戰爭的不變手法是「以大量提供新聞資訊來掌控傳播」，而於 2003 年波斯灣戰爭更臻純熟運用，藉以達到政府機構間、與主要盟國及作戰戰區指揮部的資訊整合與聯結。

關鍵詞：政府的媒體管理、媒體管理策略、協助性傳播、聯合採訪制、隨軍採訪

The Analysis of Media Management of U.S. in the Two Persian Gulf Wars

Perng-Cherng Fang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ssistant Professor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ying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documentary analysis, was to examine the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of media management of the U.S. government and armed forces in the two Persian Gulf Wars.

Discussion will include what the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of media management were in the two Persian Gulf Wars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what the correlation of these between the two wars was.

Key words: media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strategy of media management, facilitative communication, national media pool, escorting

壹、前言

艾森豪將軍有句名言：「軍事作戰的頭等大事是不讓敵人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情報，而報紙、廣播的頭等大事則是盡可能擴大報導。我們的工作是盡力協調好各種不同的要求。」這句話曾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後，被美國國防部用作該次戰爭檢討報告書〈媒體規範〉單元的卷首語，藉以強調美軍對作戰新聞內容的規範一向重視在「作戰安全與民眾知的權利」之間取得應有的平衡。

由於傳播科技的進步，1991 年波斯灣戰爭是一場資訊化戰爭，但對美國而言，存在著另有一層更重要的意義。Adams (1998) 曾指出這個戰爭像是一場兩面戰爭，一面是回顧過去，另一面又展望新的戰爭方式；回顧的是如何消除越戰負面影像的傳播方式帶來的傷害，展望的是如何透過接納媒體與新聞記者招待會的形式，而形成一個與越戰不同面貌的電視戰爭。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老布希總統、五角大廈及其軍事指揮官接受越戰的教訓，採取極其周密的新聞媒體管制。跨入新世紀的全球化傳播，網際網路興起，資訊傳播大量化，傳播手段跨國化，參與媒體國際化，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按照一己意圖，完全統一本國媒體與第三國媒體的口徑，五角大廈也做了前所未有的大改變，透過安排記者隨軍採訪，裨益雙方關係的瞭解。兩次的波斯灣戰爭之間差隔 12 年，無論時代的變化或科技的進步均有顯著不同。

媒體管理 (media management) 一詞，並非指媒體組織在市場上的經營管理，在此是指政府與軍方如何與媒體相處所採取的方式或作為，尤其在戰爭期間內，如何做到如艾森豪所說在軍方與媒體之間「盡力協調好各種不同的要求」，或如 Ottosen (引自孫憶南譯，2006：165-166) 所言，則是軍方進行軍事準備及進行軍事行動時透過媒體「軟化」社會大眾的可能步驟¹，本文希望透過相關理論與文獻的回顧與整理，藉以了解美軍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與 2003 年波斯灣戰爭期間中所展現的媒體管理策略作為。

本文採用歷史與文獻分析法，分別針對兩次波斯灣戰爭做個案探討，將主要檢視對象置於美國政府及美軍所展現的媒體管制策略與管理作為上。本文的研究問題有三個：美國政府及美軍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的媒體管理策略與作為為

¹ 這些步驟包括：(一) 在預備期，敵國會出現在新聞報導中，被描寫成貧窮 / 獨裁 / 無政府狀態；(二) 進入合理期時，會製作出現大型新聞節目，呼籲進行武裝介入，期以迅速恢復該國正常狀態；(三) 在執行期時，透過新聞管理與新聞審查制度，開始對新聞報導進行管控；(四) 在戰後，新聞描述該國已恢復正常，使得該國又失去新聞價值。

何？在 2003 年波斯灣戰爭又有那些媒體管理策略與作為？這兩次相距 12 年的戰爭在媒體管理策略與作為上究竟有何關連？

本文計分五節，第一節前言；第二節相關文獻檢視；第三節 1991 年波斯灣戰爭的媒體管理作為分析；第四節 2003 年波斯灣戰爭媒體管理作為分析；第五節則綜合前兩節做出結論。

貳、相關文獻檢視

本節針對政府的媒體管理、媒體管理策略、協助性傳播等相關理論及文獻進行檢視，以作為後續分析的參考架構。

一、政府的媒體管理

美國媒介社會學學者 Michael Schudson (1978) 曾分析一次大戰至 1960 年代越戰期間美國政府對媒體的新聞管理 (media management)，他所謂的新聞管理主要在檢視政府如何以控制新聞資訊方式，防止或矇蔽媒體的參與及報導。其實由於越戰失敗的陰影與教訓²，促使美國等國的政府對新聞媒體的管制至今一直延續不斷。

英國媒體與政治學者 Oates (2008) 亦使用 media management 一詞，來說明戰爭時期帶給政府 (包含軍隊) 與媒體之間所遭遇的各種機會與挑戰。他分析影響戰爭新聞的因素計有：全球政治情勢、一國政治領導者與精英如何塑造衝突與戰爭、軍隊的資訊管制、戰爭發生地點與時間長短、媒體系統、記者的自我認知或愛國態度、新媒體通路的發展等。

與戰爭時期對媒體管制有別的，McNair (1999) 則從政治傳播角度切入，探討政治人物或組織如何接近、運用媒體，以增加其在媒體上的曝光度。McNair (1999: 128-129)，將政治公關分為四種類型活動：(一) 媒體管理 (media management)，此係政治人物以製造新聞事件 (medialities) 或以議題管理方式等增加曝光度；(二) 形象管理 (image-management)，是指塑造政治人物個人形象，同時依據組織的性質與目標塑造組織形象；(三) 內部溝通，包括組織內

² 美軍一向有所謂「越戰症候群 (Vietnam syndrome)」的教訓。這種情形更確切說，可以 Frank Aukofer 與 William P. Lawrence 一項有關軍方與媒體關係的研究所指的「後越戰歸咎媒體症候群 (Post-Vietnam Blame the Media Syndrome)」為代表，因為這項研究進行於 1995 年，也就是在越戰經過 20 幾年後，仍有超過 64% 的美國軍官同意是新聞媒體的報導危害到美軍的軍事行動 (Aukofer & Lawrence, 1995)。

訊息傳遞、訊息調整、活動安排及訊息回饋等；（四）資訊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此被 McNair 認為是一種重要的政治武器，政治人物往往可以發布、限制或扭曲等方式來影響民意，影響人民的生活，以及打擊對手。

與此相關名詞有許多，學者（參見臧國仁，1999：167-168）曾加以整理，包括新聞發佈（publicity）、媒體行銷（media marketing）、媒介可見度（media visibility）、媒體事件（media events）、媒介議題監控或環境掃描（media agenda monitoring or environmental scanning）、形象管理（image management）、新聞管理（news management）、新聞策略（press strategies）、媒介策略（media strategies）、媒介手段（media techniques）、政治行銷（political marketing）、政治推銷（promotional politics）、策略性政治溝通（strategic political communication）、資訊與意見管理（information & opinion management）等。

二、媒體管理策略

法國學者 Mattelart 在《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La Communication-monde）》道出戰爭時期「政府管理輿論」的必要性。他指出 Lasswell（1927）在戰爭宣傳研究上的主要貢獻，在於闡明戰爭期間僅僅動員人力和物力是不夠的，還必須要與輿論動員或輿論管理，「因為讓傳播自由所產生的危險比濫用權力所產生的危險還要大」（陳衛星譯，2001：63）。即便如此，「政府管理輿論」及政府的媒體管理也是與時俱進的。誠如 Choukas（1965）所言，宣傳起先是藝術的，以後是科學的，這一切可說是窮盡每一代的知識累積。

國內外學者曾對 1991 年波斯灣戰爭期間美軍所採取媒體管理策略加以分析。例如 Taylor（1992）、Woodward（1993）分析美軍運用伴隨（escorting）來遂行聯合採訪制的新聞集體供應；Bennett & Manheim（1993）舉出美軍訊息管理有三種策略：限制接近（limiting the access）、管制記者發布新聞內容（managing the news），以及建構符碼與形象（constructing symbols and images）。

Luostarinen（1992）、臧國仁（1999）指出美國軍方慣用的控制媒體方法是：（一）餵食（feeding），軍方以記者會方式提供訊息，包括誤導敵方的假資訊（disinformation）；（二）競爭，指軍方減少訊息供應量，引起新聞媒體爭相向軍方獲取獨家消息；（三）限制，即阻絕新聞記者接近戰爭現場，藉以控制消息供應的獨家管道（臧國仁，1999：181）。

O'Heffernan（1994）歸納美國在媒體管理上的主要策略有：更改媒體訴求的框架方向、主動提供新聞影像及記錄片、供應大量新聞簡報與背景資料、資訊流通管制、避免以正常管道提供詳細資訊、新聞檢查、訴諸愛國心，以及以技術因

素困擾媒體記者直播或蒐集資訊等。

基於媒體組織對政府的媒體管制許多嚴厲批評，2003 年波斯灣戰爭採行隨軍採訪，Shepard 指出美國軍方希望藉此避免類似 1991 年波灣戰爭及阿富汗戰役時限制媒體報導的情形重演，但基於擔心記者洩露機密及部隊安全，長期以來對媒體抱持的態度就是控制媒體，限制媒體採訪部隊行動或個別的三軍官兵（劉得詮譯，2005）。

胡光夏曾歸納 2003 年波斯灣戰爭美軍新聞策略有九項，包括允許媒體記者隨軍採訪、制定隨軍採訪規則、頒布新聞守則、要求媒體自制、封殺或驅逐戰地記者、舉行記者會及戰情簡報、抵制半島電視台、篩選軍隊內部的新聞與娛樂訊息、適度干擾衛星傳送戰情新聞（胡光夏，2003），以及媒體策略有討好餵食策略與限制策略兩種（胡光夏，2004）；方鵬程（2006）分析美伊雙方全球傳播的媒體操控則主要有公共外交的包裝策略、媒體公關的餵食策略及新聞採訪的管制策略等三種。

三、協助性傳播

Doob（1966）提出的「次級宣傳（subpropaganda）」，指宣傳者欲在有限時間內傳達為民眾所能接受的信念，喚起閱聽眾及傳播媒體的注意力，必須妥善運用許多技巧。

曾經服務於美國新聞總署（USIA）九年的 Martin（1971），則將次級宣傳稱為「協助性傳播（facilitative communication）」，意指宣傳者展現善意，創造友善氛圍，以新聞稿、書刊、簡介、展覽、研討會、查詢服務及個人聯繫等方式，維繫與媒體及其從業人員的管道暢通，促進宣傳目的的達成（Jowett & O'Donnell, 1992：22）。

在美軍內部的協助性傳播，則稱之為「協助媒體（media facilitation）」³。這是指在作戰採訪的過程中，美軍針對民間媒體與軍方媒體的文字與攝影記者等提供完成新聞採訪的必要協助。協助事項包括：協助媒體記者進入作戰區域、登記與管制媒體代表、向媒體簡報基本規則與安全限制、安排採訪事宜、進行作戰簡報、提供媒體食宿交通、通訊工具與安全設備、安排與接待軍事採訪團等

³ 依據美國陸軍準則 FM46-1「公共事務運作（Public Affairs Operations）」與 FM3-61.1「公共事務戰術、技術與程序（Public Affairs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的規定，美軍戰時新聞處理工作包括「公共事務計畫（PA planning）」、「協助媒體（media facilitation）」、「訊息策略（information strategy）」及「公共事務訓練（PA training）」等主要工作。

(FM46-1-1:48-49)。為達成上述協助媒體事項中，不可少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設立「媒體中心 (media center)」。

依據美軍準則 (FM46-1-1:54)，作戰行動開始後的 24 小時內，必須在戰地開設具有媒體中心雛形的「臨時媒體中心 (hasty media center)」，立即進入協助媒體各項作業狀況。媒體中心依部隊層級而有不同的名稱 (FM46-1-1:49-53)，例如由美軍聯合作戰司令部 (Unified Command) 或聯合任務部隊 (JTF) 開設的稱為聯合新聞局 (Joint Information Bureau, JIB)；由聯盟司令部 (Combined Command) 開設的稱為聯合新聞中心 (Allied Press Information Center, APIC) 或聯合新聞局 (Combined Information Bureau, CIB)；在聯合作戰司令部下由各軍總自行開設的稱為媒體運作中心 (Media Operation Center, MOC)。

以上各種不同名稱的「媒體中心」功能大同小異，至少涵蓋以下十項工作 (FM46-1-1:48-49)：(一) 作為作戰區域內媒體新聞的消息來源；(二) 執行國防部新聞指導綱要規定，並對媒體做基本規則的簡報；(三) 作為資深公共事務官主要新聞稿、資料檔案等發佈的正式地點；(四) 協調下級單位，以便進行新聞採訪，包括對採訪的人員進行必要的訓練與協助，以及提供媒體採訪時的伴隨人員 (escort)；(五) 作為各軍種、政府部門及各盟國間的協調場所；(六) 使戰區內所有人員了解地主國在文化方面的敏感事項，避免因文化的誤解產生不必要的衝突；(七) 準備並舉行媒體簡報與召開記者會；(八) 記者登記與認證；(九) 提供有證記者的必要協助；(十) 成立媒體採訪團。

參、1991 年波斯灣戰爭的媒體管理作為分析

Géré認為，1991 年波斯灣戰爭對美國政府而言，是「內部 (後方) 憂慮超過外部 (前方) 憂慮」的戰爭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譯，1998:480)。他排列出美國政府三個優先次序層面的問題：首先是內部措施，旨在獲得美國人民及國會議員的認可；其次是對作戰行動的新聞報導管理；最後才是對抗敵人的心理作戰。

所謂的「內部措施」，很大部分在於克服長期存在民眾與軍方的越戰陰影，而媒體居間扮演關鍵角色。所以 Géré指出：「長久以來，美國領導人就以越南心理作戰的失敗做為殷鑑.....。他們也了解沒有任何國家的民意像美國一樣的敏感，因此媒體扮演一決定性的角色。」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譯，1998:480)

尤其五角大廈想讓民眾對戰爭有新的理解，戰爭不再是在客廳上流著「鮮血與內臟」的戰爭 (Carruthers,2000)。老布希政府不願全球人民看到戰爭真相，更不願大家在電視畫面上看到伊拉克沙漠高速公路變成「死亡公路」 (林博文，

2003：22)。Dennis (1991：1) 指出，「軍方已做好應對媒體的萬全準備，他們的用心程度大幅超越從前」。

另一方面，很明顯的，內部措施有賴外部作為來鞏固。戰前美國國務卿貝克就曾以 10 個星期奔走 16 萬公里，會同各國外長與元首晤面達 200 餘次；老布希在 8 月 2 日至 6 日的四天中，給 12 位外國元首打了 23 個電話，終於達到獲得聯合國的支持、爭取俄國與中東國家的合作、說服 106 個國家參與對伊經濟制裁及 40 多個國家加入反伊聯盟，以及打著「共同承擔責任」的招牌，募集戰爭經費等成果（李成剛，2008：190-191）。甚且，美國在這次戰爭動員 28 個國家組成多國部隊，除了藉此來擴大聯盟外，也藉助這些國家共同進行戰爭宣傳，爭取更大的輿論支持（王玉東，2003）。

一、戰地採訪的限制

美國國防部的新聞處理有一套層層節制的詳細計畫，而其對象是大約 1600 名記者。多國部隊並非想完全封鎖消息，也不願意得罪媒體而遭惹國際輿論，因而折衝的作法是設法使所有的新聞報導儘可能符合盟軍的軍事與政治目標（McNair, 1999），因而對戰地採訪的限制出現以下三種情形。

（一）聯合採訪制的新聞集體供應

此一全國媒體聯合採訪制（National Media Pool）採行新聞集體供應的模式，基本上延續自 1989 年 2 月的巴拿馬戰爭。1600 名記者區分成兩種採訪作業體系，一種是加入媒體報導隊伍（the media reporting teams, MRTs），他們通常被編入五人為一團的記者團，隨時都保持有 25 名記者團在戰地進行採訪。只有多國部隊組成的中堅國的美英法等三國記者，可以分配到眾人期盼的 200 個席位（Taylor, 1992；McNair, 1999；Carruthers, 2000）。

另一種的其餘一千多名記者則都待在利亞德旅館內，參與多國部隊每天舉行數次的新聞簡報會，或從媒體報導隊伍採訪所得分享內容（Fialka, 1991；McNair, 1999；Venable, 2002）。

（二）伴隨

伴隨（escorting）是指上述第一種的媒體報導隊伍（MRTs），必須在美軍公共事務軍官⁴（public affairs officers, PAOs）或英軍公共關係軍官（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PROs）隨行下，才能前往接近駐紮部隊進行現場採訪。所有記者都必須經過美國中央司令部聯合新聞局（JIB）的資格審定，並限制前線採訪的記者人

⁴ 美軍有 150 名公共事務軍官從事記者隨扈工作。

數、可以採訪地區，以及記者可以採訪與交談的對象（Sharkey, 1991；Rozell, 1993；Woodward, 1993；張哲綱，1997）。

紐約時報曾經抨擊將記者編制到受監護的集體團隊，由軍官隨行在側，施以嚴密的管制措施，認為 1991 年波斯灣戰爭是 20 世紀大規模戰爭中最嚴厲限制剝奪記者採訪權的戰爭（MacArthur, 1992：7；McNair, 1999：202）。

（三）限制接近部隊

除了少數個別記者，例如獨立電視台 Independent 的 Robert Fisk 突破重圍進行自由報導外，絕大多數記者都被限制定點採訪（Sharkey, 1991；Taylor, 1992；McNair, 1999：202）。新聞記者要接近戰場或進行採訪，都要經過軍方批准並由公關軍官密切陪同。美軍不允許記者使用衛星通訊設備，而且完全控制戰區交通運輸工具，這限制了記者接近戰鬥部隊或個別士官兵的可能性（Fialka, 1991）。

二、餵食

五角大廈明白對戰地採訪的嚴格限制，必然引發媒體組織的抗議，餵食（feeding）是一種取得軍方與媒體平衡的必要方法。餵食策略主要由阻絕（stonewalling）及主動提供資訊等構成（Sharkey, 1991；O’Heffernan, 1994：241）。亦即拒絕以正常管道提供深入詳細訊息，但軍方每天舉行如排山倒海般的新聞簡報與背景說明，牽制記者無暇另尋其他消息，其中許多是現場播映，提供大量裝置在精密導彈上攝影機所傳送回來的畫面與影像（Sharkey, 1991；O’Heffernan, 1994；Seib, 2004）。餵食的另一新穎手法，是試圖將有關伊拉克戰區消息先提供給新興媒體的有線電視新聞 CNN，再由 CNN 將這些消息供應給其他無線新聞媒體（Seib, 2004；Tang, 2007）。

《紐約時報》曾有報導分析，包括老布希總統在內等政府高層官員的目標，就是要做到「資訊流通管理」，並能擺脫越戰症候群的效應（DeParle, 1991, May 5）。如以政府層級劃分，最高的是在華盛頓的國防部，主要人物是國防部長錢尼、參謀聯席會議主席鮑爾，其次是聯軍統帥史考柯夫（Norman Schwarzkopf）與中央指揮部（Central Command），接著是設在德黑蘭（Dhahran）的聯合新聞局（JIB），再下為各軍團或師主要戰鬥單位的新聞官（呂志翔，1993）。對五角大廈官員來說，則是國防部將戰爭事件及發生經過，直接藉由媒體傳送（卻迴避新聞機構編輯作業或評論式報導）給電視機前的觀眾，同時導彈拍攝的影像亦可達到新聞淨化的效果（Seib, 2004）。

當空戰開始，美國國防部長及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主席立即對新聞界召開記

者會，戰爭爆發後兩小時，老布希總統就發表了長篇公開講話（王玉東，2003），幾小時之後，也就是1月17日早上，中央司令部的總司令及空軍司令在利雅德舉行記者會。往後47天內，兩位聯參作戰情報主任在國防部副部長陪同下召開35次電視轉播的新聞記者會。應新聞界要求，沙國的作戰副指揮官每天也對交戰情況做了電視轉播簡報。總計美軍司令部召開98次簡報（53次錄影轉播，45次實況轉播）（廖埔生等譯，1994：35-36）。

三、新聞檢查

Schlesinger（1989，引自臧國仁，1999：181）指出，政府機構在戰爭期間常藉新聞檢查（censorship）施展不同程度的干預策略，以便官方說法能成為媒體上的合法觀點。媒體記者要在行動綱領上簽字，意味著他們放棄對軍方人士進行不公開採訪的權利，也允許軍隊安全部門來審查他們的報導（Carruthers,2000）。此一戰爭期間的新聞檢查又可分成兩部分：

（一）CNN總部辦公室內的新聞檢查

如前所述，五角大廈把有關伊拉克戰區消息提供給CNN，CNN又把這些消息提供給其他媒體，但在戰爭結束後，CNN負責人承認國防部工作人員曾在亞特蘭大CNN總部辦公室內工作，審查從伊拉克戰場送回的新聞資料，五角大廈允許的內容才能播出，否則只能刪除（Tang,2007：33、194）。

英國記者Fisch披露CNN的新聞審查手段：CNN對所有發回來的新聞與報導進行審查，要求記者將自己的報導內容寄往亞特蘭大總部，經總部確認和修改後才被允許播放，因此美國國務院和五角大廈對CNN的任何報導不產生任何懷疑（Tang,2007：208）。

（二）戰地報導的新聞檢查

美軍在戰爭期間實施嚴格的新聞安全檢查，規定所有戰地報導內容（包括新聞與照片等）必須當場經過公共事務小組隨扈軍官的檢查，再交由傳送單位（forward transmission units, FTUs）傳送給利亞德旅館內的記者，然後傳送全世界（Taylor,2003；胡光夏，2007）。隨扈軍官會與記者討論所發現的問題，如果不能達成協議，則送往德黑蘭的聯合新聞處處長及相關新聞媒體代表審議，如仍未達成協議，則再上呈到主管公共事務的副國防部長與相關局長一起審核，然此篇報導的刊登與否，仍取決於原報導記者的所屬媒體，而非軍方或政府。

許多媒體曾抗議軍方的新聞審查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The Nation雜誌在戰後還正式控告美國國防部（Cate, 1998；胡光夏，2007）。但根據戰後美國國防部所作檢討報告書，聯合採訪小組總計1千3百件文稿中，僅

有 5 件送達華盛頓尋求裁決，其中 4 件在幾小時內獲得圓滿解決，第 5 件報導由於涉及情報作戰細節，該篇報導的主編選擇調整內容（廖埔生等譯，1994：31-35；）。

四、扭轉媒體報導框架

扭轉媒體報導框架主要以兩種方式處理，其一是阻礙（thwarting），另一是拉攏。所謂阻礙是促使全國性媒體（報紙與電視網）檢視政府政策的機會落空，代之以公共關係方法拉攏美國地方性報紙與電視台，報導地方子弟兵參戰的人情味故事，並鼓勵地方民眾打電話到全國性媒體，對具批判性記者的愛國心提出質疑（O’Heffernan, 1994：240-241）。

五、封鎖負面的新聞

布希總統與五角大廈訂定一套縝密的政策，封鎖所有負面的新聞，以免削弱美國民眾對戰爭的支持（Hachten,1996）。例如，在衝突過後許久，外界才知曾有戰壕中的伊拉克士兵被美軍以重型推土機掩土活埋；戰場上 33 位美軍遭火焚身，家屬在好幾個月後才獲告知（Kurtz,1993：215；Hachten,1996）；五角大廈一直宣稱巡弋飛彈命中率在 85%至 90%之間，但民眾在戰後將近一年才之久才知只擊中一半目標的真相（Sharkey ,1991；Kurtz,1993：215；Hachten,1996）。

肆、2003 年波斯灣戰爭的媒體管理作為分析

隨著戰爭開打日期逐漸逼近，美國國防部所面對的是一群不願再像 1991 年波斯灣戰爭受到管制的媒體大軍。根據 CNN 資深特派員 Walt Rodger 的說法，小布希總統與錢尼副總統起初都不贊同隨軍計畫，而國防部長倫斯斐及助理副部長克拉克（Torie Clarke）積極去說服，才於 2002 年 11 月批准隨軍計畫。軍方也討厭這項計畫，而且，公共事務部門並未納入兵棋推演中，到作戰首日（Day One），公共事務部門才納入作戰計畫（劉得詮譯，2005：4）。

由於新傳播科技快速發展，讓媒體機構與記者具備前所未有的採訪便利，軍方即使想要限制，實有困難。在 2003 年波斯灣戰爭期間有關美英聯軍的新聞傳播機制，即由以下「六大構面」形成：（一）隨軍記者，（二）科威特美軍集結點的採訪記者，（三）Doha、Qatar 中央指揮部採訪每日新聞簡報的記者，（四）

未受軍方限制的獨立型記者，（五）守在白宮及五角大廈的特派員，以及（六）退役將領上電視的戰情分析。

顯然的，比較為人熟知的隨軍採訪，可以接觸到三軍部隊，比起上次波斯灣戰爭的聯合採訪制，已是大為開放的進步措施。但在「進步措施」的光鮮外表上，美國與英國已經從 12 年前大幅蛻變，亦即將 1991 年波斯灣戰爭中的「資訊流通管理」模式，成功的轉型為跨國跨洲的 24 小時新聞傳播循環機制，以確保應對上述「六大構面」的需求。

一、全球 24 小時新聞傳播循環機制

從 1991 年波斯灣戰爭到阿富汗戰爭，再到 2003 年波斯灣戰爭，美國政府新聞計畫逐漸發展成以全球各地的網絡及每日 24 小時新聞傳播的循環為基礎，結合白宮總統府、國務院、國防部，並由白宮的「全球傳播辦公室 (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 OGC)」統合政府訊息 (Hiebert, 2003; Tumber & Palmer, 2004)。這樣的循環機制不只是政府機構間的資訊整合與聯結，同時也是與主要盟國及作戰戰區指揮部密切聯結的。

美國在二次大戰後對國際輿論的引導，向來由美國新聞總署負責，該署創立於艾森豪總統任內的 1953 年，以反制來自蘇聯所發動的反美宣傳，但在冷戰結束後的 1999 年併入國務院，更名為公共外交與公共事務國務次卿辦公室，不再是一個獨立單位⁵ (Seib, 2004; Armistead, 2004: 25)。雷根擔任總統時期，雖與新聞皆偶有摩擦 (例如 1983 年的格瑞那達戰役)，但一般認為他是媒體管理非常成功的一位總統，學者們分析白宮所採取的一項有效手法是「以大量提供新聞資訊來掌控傳播 (manipulation by inundation)」 (吳恕, 1992: 25)。基本上，如前節所述的「資訊流通管理」，老布希政府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中也是廣為運用這樣策略。

在科索伏戰爭中，克林頓政府簽署第 68 號總統決策令「國際公共資訊 (IPI)」啟動運作，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建立整合全球新聞傳播機制 (Armistead, 2004)，此一機制亦是以強大的新聞資訊洪流吸引媒體即時報導，牽動民眾注意力。北約各政府官員與軍事將領除頻頻接受媒體採訪外，每天上午在倫敦舉行一個小時的

⁵ 美國國務院在 1999 年重組，將原本獨立的美國新聞總署納入其組織架構，更名為公共外交與公共事務國務次卿辦公室，負責協調國務院內部有關國際公共資訊與公共事務相關事項。但也因此缺乏統合美國政府內部資訊流通的機構，克林頓政府遂於 1999 年 4 月 30 日簽署第 68 號總統決策令「國際公共資訊 (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並在隨後的科索伏戰爭中發揮效益，但布希新政府上台後並未施行 (Armistead, 2004: 25、70)。

記者會，下午北約在布魯塞爾總部舉行記者會，晚上在華盛頓分別由白宮新聞發言人、美國政府新聞發言人和五角大廈新聞發言人舉行三個記者會。這些記者會加起來長達六至七個小時，如此國際重要媒體必須花費很長時間即時報導記者會內容（Tang,2007）。

當小布希政府面對 9·11 危機事件之後，立即聘用曾任世界兩大廣告公司主席的比爾斯（Charlotte Beers）為負責公共外交的國務次卿，同時在總統顧問休斯（Karen Hughes）主導策劃下創立臨時性單位「聯盟訊息中心（Coalition Information Center,CIC）」，負責協調後 9·11 時期的資訊傳播工作，此一單位於 2002 年由「全球傳播辦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 OGC）」取代（Seib,2004；Armistead, 2004；南方朔，2006 年 9 月 6 日）。此後，OGC 負責統合美國政府訊息工作，與全球外交辦公室（Office of Global Diplomacy,OGD）、五角大廈的戰略影響辦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 OSI⁶）形成共同對外傳播戰略機制（Armistead, 2004；李智，2005）。

OGC 前身的聯盟訊息中心（CIC）在 2001 年阿富汗戰事期間，與英國及巴基斯坦官員合作無間，分別設立以華盛頓、倫敦及伊斯蘭馬巴德三個新聞中心，為美國奠下全球 24 小時新聞傳播機制模型。根據英國《衛報》報導，倫敦方面由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傳播與策略主管 Alastair Campbell 領導，下轄十五名官員，向大西洋兩岸的媒體提供早上到中午的新聞，到了下午 2:30（美國東岸早上 9:30），倫敦將任務轉交給美國總統顧問休斯（Karen Hughes）主持的 CIC，CIC 配備 30 台電腦終端、世界主要的電視頻道及一個電子顯示的世界地圖，標明從伊斯蘭堡到華盛頓等地的日出時間，牆上的任務表則以小時為單位，註記 24 小時內在全球各地每個訊息官員的具體任務，包括對媒體進行解釋、公關和反駁等任務。到了美國東部時間晚上 9:00 時，美國聯盟訊息中心將任務轉交給設在巴基斯坦伊斯蘭馬巴德的新聞中心，此時正是伊斯蘭馬巴德第二天早上 7:00（張巨岩，2004：9-10）。伊斯蘭馬巴德新聞中心使用地點即是美國新聞總署舊大樓（Armistead, 2004）。

在 2003 年波斯灣戰爭開打前，美國政府內部已先成立一個類似阿富汗戰爭時的機制。每天白宮新聞秘書 Ari Fleischer 先與英國首相的傳播與策略主管 Alastair Campbell、白宮傳播主管 Dan Bartlett、國務院發言人 Victoria Clarke 與 Tucker Eskew 等先聯繫（Tumber & Palmer,2004；胡光夏，2007）。這個機制每

⁶ 美國國防部於 2002 年 2 月成立戰略影響辦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 OSI），成員大多是國防部文職人員、陸軍心理戰及空軍特戰人員，負責協調國防部的戰略性認知管理作為（Armistead,2004）。

日運作的例行作為包括（DeYoung,2003, March 19；Seib,2004）：

第一，每日黎明時分，美國的白宮、國務院及五角大廈與英國首相辦公室的媒體主管先行召開電話會議，為每日的新聞重點及重要問題定調；

其次，到了美國時間的中午左右，位於卡達的中央指揮部舉行每日簡報記者會，供應午間新聞需要；

第三，下午時則於五角大廈內由國防部官員進行新聞簡報會，提供資訊給美國晚間新聞及歐洲夜間新聞之用；

第四、每天結束時，白宮備妥「全球信使（Global Messenger）」，將總統及其他官員的談話重點與引述內容，透過電子郵件寄給白宮各官員、世界各地美國大使館，以及其他可能接觸到記者的人士（政黨領袖、企業經理人、宗教人士等），美國政府的一份備忘錄中曾註明「無論是在雞尾酒會上或是董事會上，都不要忘記提到這些要點。」（杜波、文家成、韓秋鳳，2004：38）

二、對戰地記者的協助與管理

對戰地記者採取協助與管制的作為，是協助性傳播的實現，基本上又區分為對隨軍記者與對獨立型記者兩種不同情形。

（一）對隨軍記者的協助與管制

美國在聯軍攻伊戰爭中首度採行開放的「陽光政策」（陳希林，2003年3月26日），此一新政策不再採取截堵消息方式，而是以「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式來影響媒體（張巨岩，2004：76）。Shepard指出，美國軍方希望藉此避免類似1991年波灣戰爭及阿富汗戰役時限制媒體報導的情形重演（劉得詮譯，2005：2）。

這是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隨軍採訪⁷，約有將近3千名來自世界各地記者經由科威特獲取必要文件進入戰場，包括經常批評美國的半島電視台（Al-Jazeera）在內，計有775位記者⁸加入美英聯軍隨軍採訪。

⁷ 隨軍記者有一段很長的歷史，早在1846年美墨戰爭時，被稱為史上最早的隨軍記者之一的George W. Kendall就被隨美軍報導戰場血腥現場，他當時設計一套複雜的戰時新聞傳遞系統，利用騎士將文稿傳到墨西哥東岸，再利用船運將訊息送往紐澳良（劉得詮譯，2005：9）。

⁸ 科威特美軍司令部新聞中心主任Larry Cox曾指出，國防部是依據後勤作業計算出可開放隨軍記者的人數，在不妨礙軍隊行動情況下，所能容納記者人數就這麼多，新聞機構所能派出記者也這麼多（Seib,2004）。計有775名美國記者與國際記者（女性佔80名）加入隨軍，其中70%名額給國內媒體，20%給國際媒體，10%給軍中媒體（劉得詮譯，2005：15）。

隨軍記者立即獲得許多協助，包括訓練⁹、食宿交通、安全保障等，每一項目所需成本都高達數千美元，無須新聞媒體支付分文，全由納稅人買單（Seib, 2004）。但隨軍記者因簽署戰地守則，報導僅能侷限在戰爭中的「點」，全程留在指定位置。幾乎每位記者都會要求前往第一線，但 775 名記者中只有 40 至 50 位能如願目睹前線戰鬥實況（劉得詮譯，2005：16）。

隨軍記者都被事先告知「軍方無法承諾媒體可以看到浩大戰爭場面」，能夠提供給記者看到的是「煙囪漏斗式戰爭」¹⁰（劉得詮譯，2005：17），這種情況和 1991 年波斯灣戰爭時聯合採訪的限制類似，因而隨軍報導被認為像是用「6、7 百根吸管」看戰爭（Seib, 2004）。

（二）對獨立型記者的處理

隨軍記者在各項規定下的採訪行動受到束縛，許多媒體機構採取雙管齊下的對策，在派遣隨軍記者的同時，另派出「獨立型記者（unilaterals）」獨立運作，總計數量高達 1800 名。

五角大廈的態度十分明確，雖然接受獨立型記者的報導，但無法給予像隨軍記者的待遇，亦無法確保給予必要時的協助，這些記者被公共事務軍官視為「玩撲克牌時不想抽到的雜牌（wild card）」（劉得詮譯，2005：35）。美國國防部發言人 Bryan Whiteman 曾聲稱，非隨軍記者會被看作是一般平民，並對他們保持一定的警戒程度，他認為伊拉克人也有可能「有人冒充為記者」（Kurtz, 2003, April 3）。

三、律定戰地規則

根據五角大廈對於媒體作業「兼顧媒體採訪需求與作戰安全需求」的指導原則，軍方不禁止媒體使用任何特定的傳播工具，部隊不得以記者個人安全為由，限制隨軍記者進入戰鬥區域（Seib, 2004），另一方面，美軍中指部在首次召開新聞發布會時就明確提出「三不政策」：不准問美軍與英軍的傷亡情形，不准問與目前的軍事行動的有關問題，不准問與今後軍事行動計畫有關的問題（胡光

⁹ 五角大廈舉辦記者戰地訓練營（boot camp），雖未硬性規定隨軍記者均需接受軍事訓練課程，但亦不否認參加記者較有機會分配到較好的隨軍單位。據統計有 234 名記者報名參加，訓練課程安排在陸戰隊的 Quntico 基地、維吉尼亞州海軍的 Norfolk 基地、喬治亞州的福班寧及紐澤西州的福特迪克西等基地（劉得詮譯，2005：19）。

¹⁰ 此語係指見樹不見林之意，根據聯軍司令部公共事務軍官 Rick Thomas 上校的說法，「隨軍記者基本上是透過稻草來看戰爭，他們可能看到一場可怕的營戰鬥，但卻無法獲得完整戰略或作戰之全貌。」（劉得詮譯，2005：18）

夏，2007：202）。

記者願意隨軍採訪，必須簽署協議，遵守國防部律定的戰地規則，其中重要規範隨軍記者的事項有（劉得詮譯，2005：17）：

（一）禁止攜帶武器，離開指定單位，擅自駕駛自己的交通工具或擅自行動；

（二）遭受生化武器攻擊時，記者必須備有防彈夾克、鋼盔及生化防護工具；

（三）禁止報導正在執行中的任務；

（四）禁止以「不作紀錄（off the record）」為藉口，專訪軍事人員；

（五）禁止報導特定已完成、延誤或取消的任務，禁止報導將執行的任務；

（六）基於作戰安全考量，禁止報導洩密、打破禁忌；

（七）當新聞報導可能危及部隊安全或任務結果時，戰場指揮官有權暫時限制新聞傳送或報導。

四、網羅退役將領上電視

退役將領每晚出現在電視談話節目，以地圖、報表及作戰計畫評論戰況，例如 CNN 經常邀請三位退役的軍事分析家是空軍少將 Donald Shepperd、陸軍少將 Wesley Clark 及陸軍准將 David Grange，在 Lou Dobbs Moneyline 節目中分享他們的經驗。

軍事分析專家自 1991 年波斯灣戰爭期間開始出現在電視及廣播節目上，但工作份量大幅增加，甚至退役將領搖身一變為「電視明星」，則是 2003 年波斯灣戰爭的 3 月 20 日至 4 月 21 日，總計在美國三大無線電視網（ABC、NBC、CBS）及 CNN、FOX News、MSNBC 出現 214 次（以 CNN 邀請分析家 55 次最多，最少的 ABC 也有 29 次之多）（Seib, 2004）。

當時五角大廈官員對這些退役將領上電視的滿意程度不高，國防部長倫斯斐也有微詞，認為隨軍記者的分析要好得多（Seib, 2004），但幾年後顯現的真相是退役將領上電視背後推手正是五角大廈。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紐約時報透過司法訴訟取得五角大廈一批將近 8 千頁文件調閱權，顯示五角大廈至少網羅 75 位退役將領與校級軍官，扮演戰爭輿論的推手，其中以 FOX News 最多，其次是 NBC 與 CNN（閻紀宇，2008 年 4 月 21 日）。五角大廈內部文件一再以「訊息戰力倍增器（message force multipliers）」或「代理人（surrogates）」，稱呼這些御用名嘴。這些名嘴不僅是政府立場與訊息的傳聲筒，亦宛如軍方潛伏在電視台的特工，他們會透露電視台規劃中的報導

方向，建議國防部如何反制媒體報導（陳泓達，2008年4月21日）。

五、滿足媒體需求、懷柔與「影響報導」

美英聯軍對前來採訪媒體的態度，可謂「來者不拒」，盡其所能滿足媒體需求。如路透社、法新社等反戰媒體及阿拉伯國家所派出的媒體，仍儘可能提供充足訊息，以防媒體在資訊不足情況下，造成不利聯軍的報導，而對於如 CNN、ABC、BBC 及美聯社等「能見度及影響力」較大的電視及主流媒體，給予的協助較前者更多（陳希林，2003年3月26日；余一鳴，2003）。

在戰事緊張之際，半島電視台播出聯軍部隊士兵死亡及被俘的畫面，美國官員雖然感到不滿，但實際採取的是「影響報導」策略，利用新聞供應及該電視台在阿拉伯世界極大的傳播影響力，讓敵方明白他們無法打贏戰爭（Seib, 2004）。

對半島電視台，五角大廈極盡懷柔，曾提供四個隨軍記者空缺赴巴林與科威特境內的美軍部隊隨行採訪（後來該電視台只用了一個名額），許多美國官員包括倫斯斐、鮑爾、萊斯都曾接受該電視台獨家訪問，美軍設在卡達首府 Doha 的中央指揮部舉行新聞簡報會時，都會安排一個最前排位置給半島電視台，也會特別點名該台記者發問（Seib, 2004）。

六、審慎處理負面新聞

好消息的傳播，例如當美國愛國者導彈成功攔截飛毛腿導彈的電視畫面增多，自然有益民意支持率也上升。然而，對壞消息則做極為細緻的準備工作，並且在宣佈的方式上也做些文章，以分散民眾對壞消息的注意力。

例如，在爭奪海夫吉城的戰鬥中有 11 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陣亡，美軍就以十分謹慎態度面對此事。在主持每日簡報記者會時，他們先給記者介紹當天的戰況，接著播放美軍炸毀伊拉克一座橋樑的影片，在 23 分鐘後才向新聞界宣布此事（杜波、文家成、韓秋鳳，2004：38-39）。

伍、結論

1991 年波斯灣戰爭是首次經由衛星傳播，開啟戰爭實況傳播的歷史新頁。記者只須帶著輕型攝影機、手提電腦、衛星電話與衛星上行與下行傳送設備，就

可毫無阻礙的完成立即採訪與傳輸的任務¹¹（Dennis ,1991；Carruthers, 2000：132；吳福生譯，2001）。不過，那時衛星傳播設備笨重，必需用卡車載運，傳送畫面費用昂貴。

到了 2003 年時，戰地記者不再事事仰賴軍方，而是全身最新設備的「科技型記者」（Seib,2004）。衛星傳播設備的價格降為二萬美元，體積縮小為 15 磅，傳送畫面每分鐘不到六美元，而且，以往僅有國家安全人員能使用的衛星攝影已是任何人持信用卡上網即可訂購，DigitalGlobe 於 2001 年啟用的「捷鳥衛星（QuickBird satellite）」可以從一萬英尺高空向地表連續攝取，提供解析度 60 公分的影像（Seib,2004）。

這些轉變從大型媒體到地方性電視台均能輕易擁有，使 1991 年 CNN 一家獨秀為之改觀，不僅如此，衛星與網際網路對傳播過程的接收者亦具特別意義。Held（1995：123-124）指出，閱聽人不再是過去被動的受眾，而是「直接閱聽人」，可以立即獲取全球事件與許多遠方的資訊，並且任何遠方發生的事件立即衝擊全球各地的日常生活，凡此均意謂著政府與軍隊所需應對的媒體關係情勢益趨複雜。

如 Géré 所言，長久以來的美國領導人就是以越南心理作戰的失敗做為殷鑑，這層「內部憂慮」使他們深刻了解美國民意對戰爭的敏感性，以及媒體扮演的決定性角色。他們不面對戰爭時還好，一旦面對戰爭威脅時立即湧現的越戰陰影，都直接且敏感的牽動政府與軍方的媒體管理政策，亦即必須打的戰爭必是一場「絕對不是越戰」的戰爭。老布希總統、五角大廈接受越戰的教訓，採取極其周密的聯合採訪制的新聞媒體管制。跨入新世紀的全球化傳播，小布希總統、五角大廈做了前所未有的大改變，透過安排七百餘名記者的隨軍採訪，裨益政府與媒體雙方關係的瞭解。

以學者對 1991 年波斯灣戰爭所做媒體管理策略分析來說，即可知道這是一個極其嚴格管理的戰爭；其次，從美國政府與美軍的媒體管理作為看，主要由戰地採訪的限制（包括聯合採訪制採行新聞集體供應、伴隨及限制接近部隊）、餵食（以阻絕及主動提供資訊等構成）、新聞檢查（CNN 總部辦公室內的新聞檢查與戰地報導的新聞檢查）、扭轉媒體報導框架（包括阻礙與拉攏）、封鎖負面的新聞等構成。

美國政府與五角大廈為驅除越戰負面效應，對戰地採訪採取嚴格限制，亦深

¹¹ 雖然大多數記者在戰場上被限點採訪，但 CNN 記者阿內特（P. Arnett）從巴格達(Baghdad)傳送在伊拉克的採訪報導，而其他的 CNN 記者則分別從華盛頓和沙烏地阿拉伯，傳送美軍和聯軍的相關新聞(Altschull, 1995)。

知必然引發媒體組織的抗議，餵食（feeding）是取得軍方與媒體平衡的方法，但無論由新聞簡報會所提供的資訊流通管理，或是間接運用新興媒體 CNN，亦都是在嚴格控制與管理下完成的，尤其是對 CNN 總部辦公室內的新聞檢查可做說明。

由於新傳播科技快速發展，讓媒體機構與記者具備前所未有的採訪裝備，軍方即使想要限制實有困難，而且五角大廈所面對的是一群不願再像 1991 年波斯灣戰爭受到管制的媒體大軍，開放記者隨軍採訪是 2003 年波斯灣戰爭最明顯的改變，且提供較上次戰爭更完備的協助措施。雖是如此，基於軍隊安全的考量，仍對戰地記者採取必要的管制作為，但對隨軍記者與對獨立型記者則呈現兩種不同情形。

兩次波斯灣戰爭差隔 12 年前，出現大幅蛻變痕跡，比起上次波斯灣戰爭的聯合採訪制，隨軍採訪不只是大為開放的進步措施，而且將資訊流通管理，成功轉型為跨國跨洲的 24 小時新聞傳播循環機制。此一機制符應了「六大構面」（包括隨軍記者、科威特美軍集結點的採訪記者、中央指揮部採訪每日新聞簡報的記者、獨立型記者、白宮及五角大廈的特派員，以及退役將領上電視）的需求。

白宮與五角大廈在面對戰爭時，無不從越戰汲取經驗與教訓，1991 年波斯灣戰爭呈現的是以媒體管制與限制為主的策略與作為，2003 年波斯灣戰爭則是在開放中做到有效的管制與限制，貫穿兩次波斯灣戰爭的不變手法是「以大量提供新聞資訊來掌控傳播」，而於 2003 年波斯灣戰爭更臻純熟運用，藉以達到政府機構間、與主要盟國及作戰戰區指揮部的資訊整合與聯結，以及吸引媒體即時報導，牽動民眾注意力的目的。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 王玉東（2003）。《現代戰爭心戰宣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方鵬程（2006）。〈全球傳播的媒體操控與框架競爭：以 2003 年波斯灣戰爭為例〉，《復興崗學報》，88：71-96。
- 余一鳴（2003）。〈美伊戰爭中的新聞管制〉，軍事社會科學叢書編輯部（編）《從政治作戰構面析論美伊戰爭》，頁 111-138。台北：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杜波、文家成、韓秋鳳（2004）。〈海灣戰爭心理戰回顧〉，杜波、韓秋鳳、文家成（編）《全方位心理戰》，頁 3-145。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李成剛（2008）。《第一場高技術戰爭：海灣戰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李智（2005）。《文化外交：一種傳播學的解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林博文（2003）。〈美國文宣大戰操控媒體手法曝光〉，《亞洲週刊》，17（2）：20-22。
- 吳恕（1992）。《激盪與調和：政府、官員與新聞界的關係（美國事例的驗證）》。台北：正中。
- 吳福生譯（2001）。〈數位時代的軍隊與媒體關係〉，《數位戰爭：前線觀點》，頁 323-362。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原書 Bateman III, R. L. Ed. [1999]. *Digital War : A View from the Front Lines*. Novato, California: Presidio Press.）
- 胡光夏（2003）。〈2003 年美伊戰爭新聞處理之研究〉，《復興崗學報》，78：193-220。
- 胡光夏（2004）。〈美伊戰爭中「框架」的爭奪戰：電視就是戰爭工具〉，軍事社會科學叢書編輯部（編）《軍事社會科學的功能與運用（上）：第七屆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97-474。台北：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胡光夏（2007）。《媒體與戰爭：「媒介化」、「公關化」、「視覺化」戰爭新聞的產製與再現》。台北：五南。
- 南方朔（2006 年 9 月 6 日）。〈廣告公關人的政治鏡子〉，《中國時報》（台北），第 a4 版。
- 孫憶南譯（2006）。《全球媒體時代：霸權與抵抗》。台北：書林。（原書 Steven, P.

- [2003]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Global Media.*)
-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譯 (1998) 。《心理作戰》。台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
(原書 Géré,F. [1997] .*La Guerre Psychologique.Economica.*)
- 張巨岩 (2004) 。《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和戰爭》。北京：三聯書店。
- 張哲綱 (1997) 。《美國戰時新聞管制之研究：以波斯灣戰爭為例》。台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希林 (2003 年 3 月 26 日) 。〈戰情陽光化〉，《中國時報》(台北)，第 9 版。
- 陳泓達 (2008 年 4 月 21 日) 。〈布希政府收買軍事名嘴〉，《自由時報》(台北)，第 a6 版。
- 陳衛星譯 (2001) 。《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原書 Mattelart,A.*La Communication-monde.*)
- 楊曉紅、王家全譯 (2005) 。《新聞政治的幻象》。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原書 Bennett,W.L..*News: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 廖埔生等譯 (1994) 。《波灣戰爭檢討報告書 (六)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原書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2]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 閻紀宇 (2008 年 4 月 21 日) 。〈美軍事名嘴 五角大廈秘密武器〉，《中國時報》(台北)，第 f2 版。
- 劉得詮譯 (2005) 。《縮短鴻溝：軍媒關係與伊拉克戰爭》。台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軍事發言人室。(原書 Shepard,A.C. *Narrowing the Gap : Military,Media and the Iraq War.*)
- 臧國仁 (1999) 。《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

英文部分

- Adams ,J. (1998) .*The Next World War: Computers Are the Weapons and the Front Line Is Everywhe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Altschull, J. H. (1995).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 Armistead,L.(2004). *Information Operations. : Warfare and the Hard Reality of Soft Power.* Washington DC: Brassey] s INC.
- Aukofer,F.,&Lawrence,W.P. (1995) .*America's Team,the Odd Couple : A Report 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the Media*. Nashville, TN : The Freedom Forum First Amendment Center.
- Bennett, W.L., & Manheim, J.B. (1993) .Talking the Public by Storm : Information, Cueing,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the Gulf Conflic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 10 : 331-351.
- Baudrillard, J. (1995).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
- Carruthers, S. L. (2000). *The Media at War: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Y: St. Martin's Press Inc.
- Cate, H. C. (1998). Military and Media Relations. In Sloan, W.D., & Hoff, E.E. (Eds.), *Contemporary Media Issues* (pp. 105-119). Northport, AL: Visim Press.
- Choukas M. (1965) .*Propaganda Comes of Age*. Washington, D.C. : Public Affairs Press.
- Dennis, E. E. (1991). Introduction. In Dennis , E.E. , Stebenne, D., Pavlik, J., Thalhimer , M., LaMay ,C., Smillie, D., FitzSimon, M., Gazsi, S., & Rachlin ,S. (Eds.), *The Media at War: The Press and the Persian Gulf Conflict* (pp.1-5). New York: Gannett Foundation Media Center.
- DeParle, J. (1991, May 5) .Long Series of Military Decisions Led to Gulf War News Censorship. *New York Times*, A1.
- DeYoung, K. (2003, March 19) .Bush Message Machine Is Set to Roll with Its Own War Plan. *Washington Post*, A1.
- Doob, L.W. (1966) .*Public Opinion and Propaganda*. Hamden, CT : Archon.
- Fialka, J. J. (1991). *Hotel Warriors: Covering the Gulf War*.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Hachten, W. A. (1996). *The World News Prism: Changing Media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mes, I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Held, D. (1995)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 Hiebert, R.E. (2003) .Public Relations and Propaganda in Framing the Iraq War : A Preliminary Review,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9, pp.243-255.
- Jowett, G.S., & O' Donnell, V. (1992).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 Kellner, D. (1995). *Media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 Routledge.
- Kurtz, H. (1993) .*Media Circus*. New York : Times Books.
- Kurtz, H. (2003, April 3) .*The Ups and Downs of Unembedded Reporters*. Washington

- Post,C1.
- Lasswell, H. D. (1927).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London: Kegan Paul.
- MacArthur,J.R. (1992) .*Second Front :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in the Gulf War*. New York : Hill & Wang.
- Martin, L. J. (1971)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398,61-70.
- McNair, B.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Oates (2008) .*Introduction to Media and Politics*.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s.
- O’Heffernan,P. (1994) .A Mutual Exploitation Model of Media Influence In U.S. Foreign Policy.In Bennett,W.L., & Paletz,D. (Eds.) ,*Taken by Storm : The Media,Public Opinion,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pp.231-249)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zell,M.J. (1993) .Media Coverage of the Persian Gulf War.In Whicker,M.L.,Pfiffner,J.P., & Moore,M.R. (Eds.) ,*The Presidency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Westport : Praeger Publishers.
- Schlesinger,P. (1989) .From Production to Propaganda ? *Media,Culture,and Society* ,11 : 283-306.
- Schudson,M.(1978).*Discovering the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 Basic Books.
- Seib,P. (2004) .*Beyond the Front Lines :How the News Media Cover a World Shaped by War*.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 Sharkey, J. (1991). *Under Fire: U.S. Military Restrictions on the Media from Grenada to the Persian Gulf*.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 Tang,T. (2007) 。《全球新聞霸主 CNN》。台北：華立文化。
- Taylor,P.M.(1992).*War and the Media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During the Gulf War*. Manchester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P.M. (2003) .Journalism under Fire : The Reporting of War and International Crises In Cottle,S.(Ed.),*News,Public Relations and Power*(pp.63-79).London : Sage.
- Tumber,H., & Palmer,J. (2004) .*Media at War : The Iraq Crisis*.London : Sage Publications.
- Venable,B.E. (2002) .The Army and the Media. *Military Review* (Nob.-Dec.) ,pp.66-77.

美國在兩次波斯灣戰爭的媒體管理分析

Woodward,G.C. (1993) .The Rules of the Game : The Military and the Press in the Persian Gulf War.In Denton,Jr,R.E. (Ed.) ,*The Media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 Westview, CN : Praeger.

(投稿日期：98年4月21日；採用日期：98年5月19日)